

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传记辞典

(美) 伯纳德·S·卡茨 编著

香玲 陈勇 编译 梁小民 校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传记辞典

〔美〕伯纳德·S·卡茨 编著

香 玲 陈 勇 编译

梁小民 校

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8 号

Edited by Bernard S. Katz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89.

根据加兰有限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编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传记辞典

[美]伯纳德·S·卡茨 编著

香玲 陈勇 编译

梁小民 校

*

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5.25 印张 314.000 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定价: 8.10 元

ISBN 7-5005-1894-3/F·1793

(图书出现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译者的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 1968 年瑞典中央银行建立 300 周年之际由当时的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并经瑞典皇家科学院批准而设立的,全称为“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项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 5 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 1969 年起在每年的 10 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公布。从 1969 年到 1991 年共有 31 名经济学家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反映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与发展趋势。研究每一位获奖者在经济学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等于是对当代经济学的概况进行一次回顾。正因为如此,现编译出版这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传记辞典》,供读者参考。

本书由陈勇、香玲担任编译工作,梁小民担任校译和润色工作。此外,林青松、李实、王欣、唐寿宁和王建祥同志也参加了部分译稿的校译工作。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编译中的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0P93/32 30

目 录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69年)	
.....	桑德拉·R·鲍姆(1)
拉格纳·安东·基特·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1969年).....	G·M·彼得·斯旺(20)
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70年).....	汤姆·斯特利(40)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71年)	
.....	哈丽雅特·欣克(59)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1972年)	
.....	理查德·史蒂文森(83)
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年)	
.....	C·丹尼尔·韦恩西尔(107)
瓦西里·W·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1973年)	
.....	詹姆斯·M·马歇尔(132)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74年).....	刘易斯·科恩(150)
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4年)	
.....	阿尔文·科恩(170)
列奥尼德·康特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1975年)	

- 马丁·凯夫(186)
- 恰林·C·科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1975年)
- 凯瑟琳·A·南茨(204)
-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
- 南希·M·索恩博罗(214)
- 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1977年)
- 约翰·赫德森(233)
- 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1977年)
- 布伦·布洛姆奎斯特、克拉斯·亨里克·西文(255)
- 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78年)..... 詹姆斯·朱莉安娜·西卡尔利(272)
-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79年)
- 雷克斯福德·阿埃内(291)
-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 W. Schultz)(1979年)
- 马克·A·纳德勒(311)
- 劳伦斯·R·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1980年)
- 罗伯特·C·温德尔(327)
-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1年)
- 贝蒂·J·布莱查(348)
- 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82年)
- 托马斯·H·布鲁金克(372)
- 热拉尔·德布雷(Gerard Debreu)(1983年)
- 赛厄马克·肖杰(388)
-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84年)
- 凯文·多德(406)

- 弗兰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1985年)
..... 莫吉塔巴·西耶戴安(422)
-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86年)..... 利比·里滕伯格(442)
- 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87年)
..... 威廉·J·巴伯(456)
-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1988年)
..... 玛丽·K·墨菲(467)

简·丁伯根 (Jan Tinbergen)

(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简·丁伯根，荷兰经济学家，生于1903年，他与他的挪威同行拉格纳·弗里希共同获得了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原因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们对应用于经济过程分析的数量、动态模型的开创性发展。丁伯根在研究荷兰经济的过程中，于1936年建立了第一个大型的经济计量模型。不久后，他又建立了适用于美国和英国经济的相同模型。他将数学和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分析中是得益于物理学背景，因为他于1929年曾在莱敦大学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论述了物理学和经济学问题。他在完成学业以后，就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分析的发展上。

丁伯根的家庭充满着对知识强烈追求的气氛。他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兄弟，其中一个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即1973年诺贝尔生物学奖的获得者。他年轻时，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还是社会民主劳动党的积极分子。他拒绝服兵役，只是选择参与鹿特丹监狱管理部门的服务。他对知识的追求永远

是严格而高标准的，并始终将其置于自己的社会与政治信仰之下。其中，他的一个主要学术目标，就是应用被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发展的分析工具来说明纯自由竞争并不是最优的经济体系。

通过丁伯根那极其丰富的学术生涯，对他学术创造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敏锐性作出公正而全面的评价，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丁伯根用多种文字从事写作，其中包括荷兰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丹麦文，出版了十五本著作，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和大量小册子、报告及各类文章。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广泛的经济学分门学科，包括发展计划、国际贸易、经济政策理论、比较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还有他为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周期的经济计量模型。一直贯穿于丁伯根研究工作的线索，是对人类福利的深切关注和一个坚定的信念，即科学、数学分析能够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研究方法相结合，并能被应用于实际经济决策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之中去。

丁伯根在1929年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当时，他在荷兰中央统计局领导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研究团体。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45年，这期间他只在1936—1938年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工作了两年。1945年，他担任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丁伯根的学术生涯一直伴随着政府管理工作。1931年，他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统计学兼职讲师，两年后，他任荷兰经济学院教授。1955年，他在这里专任教授。1973年，丁伯根被任命为莱敦大学国际合作教授，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5年退休。

丁伯根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

代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一直进行经济学计量的创建工作，正是在这方面的成就使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阶段，从1945—1955年，他的主要目标是为短期经济政策制订理论。第三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把精力投入到发展中国家问题中，主要是发展理论和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政治作用。丁伯根学术生涯的第四阶段是他对个人收入分配的性质与决定问题的研究。70年代，他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探求范围又扩展到对先进工业国家之间不等的研究上。丁伯根在他学术生涯后期还写了大量关于不同经济体制比较的文章。

丁伯根终身致力于将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与实际建议和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他对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奉献，是他个人基本品质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他在数学与统计学上的光辉成就所掩盖。他宽厚谦和的为人和对人类福利事业无私的献身精神，为他的朋友与同事所称道。他对同事们的成就给予极大的关注，从不夸耀自己开创性的贡献。他生活简朴，不追求财富与挥霍。他没有把自己所得的诺贝尔奖金用于个人享受，而是用于发展中国家引入累进土地税的研究上面。丁伯根一直住在普通居民区，他宁肯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去上班而不用小汽车。他的个人品德就象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样，高尚而极具魅力。

一、经济计量学模型

丁伯根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主要致力于将经济理论数

学公式化的经验验证方法的发展。对这个目标的追求贯穿于他创建经济计量学模型的全过程。他根据这个方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1936年创建了一个荷兰经济模型,当时他创立了一个具有24个方程式的方程组。丁伯根相信,联立方程是反映大量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关系的最好手段。

在这个时期,他创建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相一致的收入形成和消费支出方程式。模型中的消费是一个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将货币流量分为价格和数量,并将滞后计入一些方程式中。这个早期模型还显示了工资性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个问题自50年代后期经菲利普斯曲线描绘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丁伯根在评价这个早期及后来的模型时曾经非常谨慎地指出,它们对经济过程的描述从实质上说,并不是纯新古典主义的。例如,丁伯根不是假设利益最大化行为一致性,而是将“满意的”或成本加价的定价原则融合到他的供给方程式中。尽管这些创新在长时期内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丁伯根模型在它创建时期并未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到1959年才被翻译成英文发表。

30年代中期,国际联盟要求丁伯根创建当时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经验验证方法。当时,对经济活动的波动有很多解释,但是,对这些解释加以全面论证的可靠方法,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个项目的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丁伯根于1939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一书中。此书共分二册。在第一册中,集中检验投资活动理论,丁伯根阐述了经验方法并提

供了它的应用实例。他几乎没有发现支持当时流行的投资周期的加速原理和公式化的原理的证据。丁伯根的分析应用了标准的多元回归分析,同时也应用已有方法去解决宏观经济问题。

第二册的基本意图,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从而说明美国经济的经济周期。它包括有 48 个方程式的一个方程组,构成了应用于美国经济的一个完整的宏观模型。丁伯根不是着眼于每个单一的经济阶段,而是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动态模型。他还进行了用于预测的数量分析。

虽然丁伯根的宏观模型研究在当时遭到冷遇,但他一直坚持使其技术上逐渐趋于完善。在 1951 年发表的《英国的经济周期,1870—1914 年》一书中,他的研究范围拓展到英国经济。宏观经济模型在 50 年代以前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它却使经济学界发生了革命。在近几十年间,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尽管还不够可靠,但却越来越得到经济学家、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的高度评价。

1930 年,丁伯根与拉格纳·弗里希和欧文·费希尔共同成立了“经济计量学会”。他们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发展统计学与数学相联系的经济理论,促进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数量分析。他们鼓励那种在自然科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建设性和精密性的思维方式。20 年后,他们的研究方法得到了普及,这些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们最终看到了,他们的观点和方法论已在经济政策分析中占有统治地位。

在经济计量学领域中,丁伯根对于动态理论方面的贡献和利用统计学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尝试,尤为人所乐

道。他是最早应用不同方程式进行动态分析的,这个方法在30年代末成为一种分析模式。丁伯根还因创建了说明单个市场周期的“蛛网理论”而受到赞誉。这个理论阐述了价格和产量的短期波动,特别是在农产品市场。他认为,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有1年的滞后期,而需求的反应则是即时的。更广为人知的是,丁伯根最早创立了经济计量学模型,它保证了可靠的短期经济预测,并导致多种合理政策的选择,奠定了他的经济计量学理论重要创始人的地位。

二、经济政策分析

在完成了改革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途径的基础工作之后,丁伯根放下了进一步完善其方法论的工作,而将注意力投到新的、但又与此相关的领域中。1945年,他担任了新成立的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在这期间,他专注于经济政策制定的一般理论问题。除了许多较短的文章外,丁伯根还出版了几本关于这个论题的著作。其中包括《经济政策理论》(1952年)、《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1954年)、《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1956年)。

为了系统地论述经济政策问题,丁伯根将政策变量划分为三类,即目标、数据和工具。他认为,只有工具变量至少与目标变量相等时,政策才会变得富有效率。例如,如果货币供给增长率是唯一的政策工具变量,那么,将要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调整到合适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成为进行全部政策分析的基本前提,但在当时,政策目标通常是被分开来

考虑的。丁伯根把经济政策看作是由许多相关的政策目标组成的,而这些政策目标的实现又依赖于足够数量的政策手段。这是丁伯根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

在此领域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丁伯根在探讨政策问题时,一开始引入了一种由一定的经济变量和相同变量的结构方程所描述的特定经济。如果经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数量相等,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制订政策来实现目标。后来,丁伯根介绍了一些灵活的目标,也就是他所关注的实际收入最大化与失业最低化这样的目标,而不是实现某个特定失业水平的目标。

丁伯根不是把经济政策看作为好象总是一个政策制订者享受绝对决策权力的状况,而是强调了更为复杂化的分散政策制定的状况。他考察了与分散决策相比,在特殊情况下集中决策的优缺点。在分散决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误解是,决策者往往受到其他决策人行为的影响,也就是类似在寡头状况下的决策方式。

丁伯根明确指出了分析问题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区别。在分析问题中,政策手段是既定的,经济变量(例如,收入、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取决于有关模型,而政策研究则相反,丁伯根发展了一种“决策模型”。该模型不是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些政策和对其结果加以预测,而是把一些目标(例如,为社会接受的失业与通货膨胀水平)作为既定的,并推导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优政策。

丁伯根还发展了一个应用于政策分析的数量框架,并由此提出,最优方式是政策制定分散化与集中化的混合。从原则

上讲,分散化是最优的,但是,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又要求更多一些的集中决策。丁伯根对缺少超国家决策机构尤为关注,他根据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这样的机构是必要的。

丁伯根的目的,在于用数学表示经济政策决策中的各种问题。他强调经济观点的数学化具有精确性,但是,他又谨慎地说明,这些经济观点不可能独立于学术、法律、技术和心理因素。丁伯根的政策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福利经济学,而是直接涉及到实际经济中的实际政策。他积极发展能够迅速地用于推进当前经济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的理论。

他在1956年发表的《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是不同经济学家论述在实践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的系列著作中的一本。全部著作主要都是采用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丁伯根在他的著作中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得益于他经历中的两个方面——在中央计划局的工作以及和朋友们对经济政策多方面的探讨。他的许多有关观点,都得到了荷兰工党的认可。他的基本目标是将经常处于肤浅、盲目方式的争论引导到客观、科学的分析中去。

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50年代中期,丁伯根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与发展问题,以及国际合作与一体化问题上。他对贫困国家的问题具有敏锐的直觉,同时也被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比荷卢经济联盟的成立所激励。他在发展领域的成就,是他对人道

主义活动的贡献和他的人类理想主义的观点的自然结果。他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修补因殖民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不幸。

1955年，丁伯根辞去中央计划局的职务，在荷兰经济学院任发展计划学科教授。他开始就发展问题进行广泛的写作，同时还担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顾问。自1966年至1972年，他担任了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关于独立发展问题的专家顾问团体。丁伯根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发展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并就政策的选择问题进行广泛的巡回讲演。他决心要为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而工作。

增进国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丁伯根优先考虑的政策问题。在1954年的著作《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丁伯根论证了国际经济一体化是自主国家之间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他将政策建议与经济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他总是认真地提醒读者。丁伯根建议国际合作应该更加计划化，并看到每个国家对短期利益的重视而引起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主张减少进口限制、统一间接税、自由兑换货币、国际发展政策和高度集中的财政政策。这些措施将使其他的政策手段更为分散化。丁伯根对于经济一体化的纯理论讨论并不满意，并极力主张，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要多搞一些定量分析。

除了对国家之间关系给予关注以外，丁伯根还对了解与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发展作出了广泛的努力。丁伯根在这个阶段写了大量著作，其中包括：《发展的设计》（1958年）、

《经济增长数学模型》(1962年,与亨德里卡斯·波斯合作)、《教育的经济计量模型》(1965年,与亨德里卡斯·波斯合作)、《发展计划》(1967年)和《国际秩序的重构》(1976年)。

丁伯根的发展模型是利用这样的假定而设计的,即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小的数据可以利用;计划者、管理者和从事发展计划的政治家们的技能是有限的。他设计了三种主要的模型。第一种是建立在三个计划阶段上的简单宏观模型。第一阶段,即宏观阶段,经济变量的总水平被作为目标,对全国的产量、储蓄、投资、资本和进出口规模制订计划。在第二阶段,经济将根据地理区域和产业或部门进行分类,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和部门资本产出系数,总体活动水平将在各部门之间加以分摊。最后,在计划的微观阶段,对单个项目进行评价和规划。

相反,丁伯根所设计的第二类模型是以单个项目为出发点,在制订了一个由许多微观计划组成的宏观计划。他还发展了与政策手段的联系更为明确的大型联立方程组。这些发展模型源于他对经济周期研究中的经济计量模型方法论。

丁伯根建议,在发达国家应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不发达国家应将目标定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这将使这些国家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最大化。他强调,政府应该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工商界及公众了解发展的潜力和优势,应该提供充足的基础投资并采取措施推动与鼓励私人投资。他认为,政府应该尊重人们的偏好,但是,他又主张,如果公众观点在某些方面缺乏远见,政府就无须考虑这些意见。

与他一贯的观点相同,丁伯根的目标是将数量科学分析